# 上篇:传　统

文明的发展，源远流长。西方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她的源头在地中海东北部的爱琴海。辽阔的大海孕育了爱琴文明，也造就了爱琴的女儿——希腊文明。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形成了希腊独特的生产方式和文明个性。崇尚理性与城邦制度是这种个性的两大特征。

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由东向西迁移扩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继承希腊文明的基础上，继续体现出自己的文明特色。拉丁民族朴实、实际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创造和演绎了一种实在、厚重的社会精神。在不断扩张其版图的过程中,在处理各民族间的矛盾和纠纷中,罗马人不仅体会和形成了一种世界意识，而且发展出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一整套原则和规矩,这就是罗马的法律。罗马开创出用法规、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节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习惯和先例。西方文明中的社会精神、世界意识和法律文化,不能不说是罗马文明所给予的。

当世俗的社会精神、世界意识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而行将衰落之际,一种精神(或宗教)的力量出现了,基督教的诞生与传播使得他们重新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还在于它奠定了西方文明中的宗教特性。这种宗教性表现在对人和世界的终极关怀以及真诚地为信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而献身。宗教性也就成了西方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

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使西方文明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日耳曼新鲜血液的注入，西方中世纪的社会精神与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基督教精神一统天下与分裂割据的社会政治并行不悖。宗教世界的教阶制度和世俗社会的封建制度,既是中世纪欧洲政治的独特景观,也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突破点。

# 第一章　城邦与理性

精神与制度的革新和健全是任何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关键。理性与城邦既是古希腊文明的主要特征，也是希腊之于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两大贡献。尽管理性属于精神范畴，城邦属于制度范畴，但二者的精神内涵实质是相通的。希腊理性孕育于城邦特有的社会与精神结构之中，城邦政治则是理性的实验场。彼此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理性与城邦之间的交融与互动，演绎出古典希腊辉煌的文明篇章。

## 第一节　希腊城邦

### 一、西方文明的起源

“希腊是西洋文化之母”。如黑格尔所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古希腊人因创造出远远超乎于他们所处时代的成熟文明而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先驱。

西方的远古文明起源于爱琴世界①，俗称爱琴文明或地中海文明。那里最具文明成就的要数克里特（Crete）、迈锡尼

①古代西方把克里特、爱琴海诸岛屿，大陆西亚和小亚细亚西部称为爱琴世界。

(Mycenae)两个部落文化。

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东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那里的文化开始兴起，并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建立了奴隶制城邦国家。克里特文明的中心是克诺索斯城。城中的王宫遗址结构复杂,千门百户且曲折相通。遗址中不仅有国王的宝殿、接待室、起居室,还有占了整个王宫的半数以上的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作坊。更为奇特的是王宫中央的复杂的取水和排水系统，直到近代以前都是最为先进的。王宫的墙上，出土的器皿上都有各种各样表现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的绘画艺术。

克里特岛不仅文化繁荣,商业也十分发达,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当时地中海沿岸的贸易中心。因为克里特人与外界的距离恰到好处：近到可以受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种影响,远到可以免遭入侵,能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特性，展现自己的个性。米诺斯文明鲜明的个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妇女似乎具有与男子一样享有同等的地位。在壁画中，克里特妇女衣着华丽,举止优雅,被考古学家戏称为“巴黎女郎”。在一些壁画中还可以看到,妇女们挤满了斗牛场的露天看台，有些甚至实际参加与牛角力的活动。

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影响较小。克里特的王宫遗址中，人们没有给心目中的神建造宏大庙宇、竖立纪念碑。规模宏大的王宫中只有很小的一间房子作礼拜堂，祭品则主要是农产品，少有用人或大批动物作祭品的迹象。

生产方式具有水陆两重特性。作为古代世界的一员，克里特岛的大多数人从事农耕。但由于岛内丘陵起伏，交通不便 沿岛海岸线曲折,有许多良港,利于航海和经商,加之岛上

山区森林茂密，为建造远航海船提供了优质木材。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克里特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驾着单桅海船，载着各地的货物，往返于地中海，有时也兼做海盗。据说在克里特，商人和海盗一样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可能他们认为两者只不过是“海员”获取自己所需物品时可供选择的不同方法而已①。

克里特村社成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与同期其他文明的村社成员相比，较为平等。

大约公元前 1400 年，克里特文明遭破坏，原因不详。一般认为可能是受到来自大陆的希腊人的入侵所致。但从此，米诺斯文明从克里特岛开始向外传播到爱琴海的诸小岛、希腊沿海地区和小亚细亚沿岸，米诺斯的文明个性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继承。

公元前 1500年，希腊南部的阿凯亚人( Achaeans)在伯罗奔尼撒东北部建立了迈锡尼文明。与克里特相比，迈锡尼文明较为逊色，那里出土的文化遗迹比克里特的粗劣、简陋，不时显示出模仿克里特甚至依赖克里特的痕迹。

公元前 1100 年，迈锡尼文明被来自希腊的另一部落多利亚人（Dorian）所灭，多利亚人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要比迈锡尼落后，希腊社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总体而言,爱琴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那里的地理环境多是一些岛屿和半岛，可称为岛国文化。岛国的资源是渔商而不是农业，岛国文化的环境决定了要靠竞争才能生存，从

①史诗《奥德赛》中写道，有一次国王涅斯托尔客气地问奥德修斯的儿子：“你是商人还是海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而发展成为一种“竞争文化”。

多利亚人攻陷迈锡尼后,起先按血缘关系组成部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半岛的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也得到改进,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向外殖民,足迹遍及希腊半岛,从此,希腊文化的中心开始北移,真正意义上的“希腊文明”(公元前 11 世纪～前 30 年)开始了。

古代希腊世界主要集中在爱琴海盆地周围，包括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希腊本土为多山地形，河谷里的小块土地是惟一适宜耕种的地区。荒凉的山坡把平原分割成块，使得陆路交通和交往极其困难。因此，海洋成为当时主要的运输线。凹陷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也使航海相对容易和安全。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希腊人很早就“喜欢大海并成为海盗、殖民者和商人”。同样,相互隔绝的肥沃平原也有利于独立城邦的形成。荒芜的山岭为分割古希腊的许多政治组织提供了天然屏障。

## 二、城邦的缘起及类型

希腊文明分散在几百个大小岛屿中，是爱琴海的水域把他们连在一起。这种状况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与古代其他民族靠血缘相连而搭成的社会结构所有不同。由于政治文化难以统一，希腊社会组织的重要形式便是城邦。

城邦的建立,除了地理环境的分散性外,也与迈锡尼文明时期希腊世界特殊的政治形势有关，[①] 更重要的还是希腊人

①迈锡尼王权丧失后，希腊世界政治格局支离破碎，且周边也没有强大的邻邦存在,生存危机不大,政治统一的紧迫性不强

进入文明方式的独特性。希腊文明的建立是与急剧动荡的海上殖民(迁徙)相联系的,也许是人口增多造成的压力,或许是人所固有的天然的冒险本性，公元前 8～前 6 世纪,希腊人不断向外扩张。许多人离开祖辈生息的故土，飘洋过海移民到新的地方，为了生存移民们必须结成一体，又由于移民大多是来自各地，血缘关系相对模糊，统一的权威难以形成。筑城聚居的必要性和世袭王权（权威）的丧失，孕育出希腊文明的独特国家(或政治)构成——城邦。“在雅典,创立这种边界(指城邦——笔者注）的动机还在内部：人们都希望生活没有强制，有心把这种意愿在制度上落实，这种需要推动了边界的产生”①

城邦,波里斯( Polis)在荷马史诗中是指堡垒(城堡)或卫城，后演化为一种政体。在西方语言中，诸如政治的（ Political)、政治学( Politics)、政体( Polity)等词均来源于城邦。一般认为，城邦是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时的国家组织形式。作为第一代国家形态，城邦有三个要素：城市、国家机构或国家机器、公民公社或公民大会。三个要素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只有具备了这三个要素，才称得上古代典型意义上的城邦。

希腊世界的城邦并不是铁板一块，在不同的形成途径和治理方式的制约下，城邦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是有所差别的。在古代希腊，强大的公民集体是城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希腊城邦就是公民自治团体在法律之下分享权利和

① 约翰·邓恩主编:《民主的历程——公元前 508～1993》,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 页

义务的一种政治体系。根据形成的条件和公民的地位作用，一般可把古希腊城邦分为三种主要类型。①

第一类是移民城邦。米利都、叙拉古是其中的典型。顾名思义，这类城邦是希腊人在公元前 8～前 6 世纪的移民浪潮中建立的。移民们每到新的居住地，为防御当地人的攻击和海盗劫掠，通常筑城而居，逐渐地城堡内的移民形成了社会与政治的共同体，建立起政府机构，城邦随之形成。

移民离开母邦迁居海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家乡被异族侵占，不甘于受奴役而远走他乡；有的因故乡竞争失败，或人口压力被迫出走；有的则是为远方美好生活所憧憬而离家出走。总之，移民中大多是不安现状，富有冒险和进取精神，追求自由、独立和平等之人，而新的生活环境也要求移民内部建立一种平等的、同舟共济的伙伴关系或同盟关系。因此，这类城邦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较为平等，多少具有契约的性质。

第二类城邦起源于种族征服,我们暂且称之为‘征服型城邦”。这类城邦以斯巴达为典型。

多利亚人在殖民(入侵)过程中,有些部落势力较大,以武力征服了原住民后，集体成为统治者。为预防和压迫被征服者的反抗，征服者们逐步实现了联合或内部统一，建立起了政治权力和国家机构。这类城邦由于内部阶级、阶层间的关系较为紧张，不可避免地把统一和强权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同样，也不可避免对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有所忽略。因而其政治

①丛日云著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 年出版)也认为希腊城邦主要分为移民性城邦，征服性城邦

体制和政治关系较为专制、集权。

第三类城邦是由氏族社会发展而自行演化而成的，一般是通过一系列改革或通过废除氏族制度，在新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雅典就是这类改革型城邦的典型，它经过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政治家不断地改革，逐渐完善了城邦制度。由于这类城邦是在改革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的，平民的力量较强，且不懈地要求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他们大多以较为开明的民主政体的形式存在。

公元前 8～前 6 世纪，不同类型的城邦在希腊犹如雨后春笋，据估计，城邦总数在 600～700 之间。他们密密麻麻、星罗棋布，点缀在辽阔的地中海上，形成古典西方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就整个古典世界而言，希腊城邦犹如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包围它的是贵族专制制度的汪洋大海(如埃及、波斯等)。因此，希腊城邦制度的生存和发展是较为艰难的。纵观整个城邦发展史，我们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 8 世纪～前 6 世纪，希腊城邦的形成期；公元前 6 世纪～前 5 世纪末，希腊城邦的繁荣期；公元前 5 世纪末～前 4 世纪下半叶，希腊城邦的衰落期。

## 三、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

在希腊城邦中势力和影响较大且具有典型性的首推斯巴达(Sparta)和雅典(Athens)。就城邦制度而言，它们分别位于政治序列的两个端点，前者是军事寡头政体的极端，后者是公民民主政治的典型。

如前所述，斯巴达属于征服型城邦，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

史条件，使它的政治制度在希腊世界具有某种独特性。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Laconia)地区。那儿土地肥沃,宜于农耕,沿海少有良港,东北和西边各有高山将其与外界相隔。这种内陆型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城邦不可避免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的特征。

公元前 1100 年左右，希腊北部的多利亚人入侵拉哥尼亚,不仅摧毁了迈锡尼文明,同时也征服了当地居民,把他们中的大多数沦为奴隶，称为希洛人(Holets),把一部分人驱逐到边远地区，成为政治上无权的自由人，称皮里阿西人(Perioikoi)，意为边区居民。[①] 可能是因为被征服者个性顽强、人数众多，迫使征服者斯巴达人建立起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②]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是征服过程中为适应斯巴达人的社会状况而逐渐建立的。它是一种贵族寡头政治，也是老人政治的典范。斯巴达城邦的政治机构主要包括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国王和监察官四个部分。其中除监察官外,其余大多是从原始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权力机构演化而来的。

公民大会。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是以一定数量的公民为支柱的。从理论上说,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公民大会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掌握一切重大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事实上,由于斯巴达公民内部利益大体一致,加之议事程序粗糙、幼稚,使公

① 一说，希洛人是征服过程中，被武力等强迫屈服的，而皮里阿西人是投降臣服的。因此，征服后两者的地位就有所不同。

② 据说，起先斯巴达人爱好艺术、音乐，对奴隶也比较宽厚，城邦生活安逸,城市繁荣。7世纪中叶，被征服者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为镇压起义，耗费了斯巴达人 20 年时间且损失惨重，也从此改变了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和统治方式。

民大会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大打折扣。公民大会每月集会一次，主要职责是表决和通过法律，选举长老会议成员和监察官。由于国家事务相对简单，公民也比较“驯服”（相对于雅典），会上一般不提出议案，也不开展辩论，只就长老会议或监察官提交的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的方式也大多采用呼喊的形式，凭呼声大小来确定表决结果，因此，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长老会议。斯巴达的长老会议由两位国王和 28 位长老组成，不仅拥有十分重要的国家权力，而且赋有特殊的使命：防止国王独裁暴政，遏制人民过份的民主要求。长老会议成员由公民从年满 60 岁以上的显赫公民中选举产生，成员终身制。长老会议的职责是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起草法律、决议，并有权讨论将哪些议案提交公民大会。利用这一职权，长老会议实际上拥有立法权，并直接控制了公民大会。由一群老年人组成的政治机构，通常不可避免地具有保守的色彩。

监察官。这是斯巴达政治体系中独有的色彩。监察官共 5 人，组成监察委员会，一年一选，负责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他们有权向长老会议控诉国王，甚至有权监禁国王；有权审查公职人员，撤换违法官吏；负责公民的教育、训练和财产分配；监督社会风尚，审理一切民事案件。另外也组织杀戮希洛人。监察官职位的设立，也许是为了整饬风纪，维系斯巴达人严肃而简朴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由于监察官必须对公民大会负责，重大事务需提交公民大会决定，加之他们的身份和产生方式[①]的平民性倾向。可以视为是斯巴达政治系统中

① 监察官一般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普通公民皆可当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难得的民主因素。①

王·斯巴达的王有两位，分别源于不同的家族，双方具有同等的权力和地位。王位世袭，但权力有限。平时王是国家军队的统帅和宗教领袖，负责宗教祭祀，战时则成为率军出征的大将军。王的日常行为则受监察官的监督。可见斯巴达的王与东方的‘王’还是有所区别的。

斯巴达政治体制的结构如图 1.1 所示。由图可见，斯巴达的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含混的，尤其是国王和监察官之间的权力界限不甚明晰，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斯巴达社会政治与阶级关系相对简单，社会生活也相对古朴，另一方面则受历史发展水平的制约。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的古典政治，不可避免地带有氏族制度的痕迹。鉴于长老会议和监察委员会在政治权力中的作用较大，我们认为它是贵族政治，又由于斯巴达公民内部长期保持着一种近乎严酷的平等，而且这种平等是斯巴达制度得以维系的基础，可以认为，贵族专制的斯巴达也有‘民主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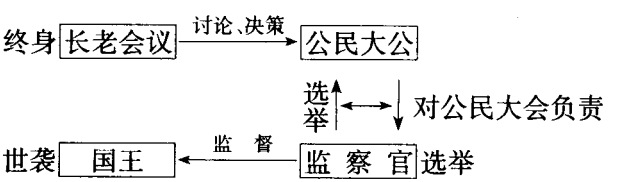



**图 1.1　斯巴达政治体制结构**

斯巴达政治制度是希腊世界特殊的一个，其主要特征是

①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视监察官为制约政府的“马勒”，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有此类言论。

平等和集体主义。显然它是与斯巴达社会制度相适应的，为了保证斯巴达的稳定与繁荣，国家严格地控制着公民的教育和私生活，整个教育制度和社会生活，都围绕着这样一个目标 培养忠于国家、献身于国家的合格公民或战士，所有斯巴达公民都是职业军人，他们不种田，不做工，惟一的职责就是训练与打仗。军人的美德，诸如团结、服从、尚武、吃苦、禁欲、牺牲精神等，也就是社会的美德。

斯巴达公民的一生都属于国家并奉献于国家。婴儿一出生，便由长老进行体格检查，合格的留下来抚养，体弱残疾者则弃之山野。儿童 7岁，便集中到兵营，被迫过那种缺衣少食的生活，迫使他们学会抢夺、追捕，甚至偷窃，还常遭受鞭打和其他残酷惩罚，这种生存训练的目的在于锻炼他们的毅力和韧性。男子 18 岁起接受正规军事训练，20 岁开始服兵役，60 岁退伍。

斯巴达公民的社会生活近乎严酷，为抑制不平等和培育集体主义，斯巴达人平时采用‘公餐’(Syssitia)制度①，国王也不例外。凡想参加某一公餐团体，须由该团体投票决定是否接受。那些不参加或不被接纳加入公餐团体的公民，也就意味着被社会所摈弃。

作为斯巴达国家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斯巴达公民必须抛弃私人的利益、感情、志趣和享受，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例如人生中最美好和重大的结婚生育，就不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城邦规定年满 30岁的斯巴达公民必须结婚，以‘生产’新

① 一般以 15人为一组，每位捐出等量的食物和钱，大家在一起用餐。据普鲁塔克记载，公餐制度曾激起富民的不满。

一代的公民。他们的婚姻对象——妇女，自然就成了生育合格公民的工具。为能担当此重任，斯巴达女子婚前必须参加与男子同样的体育锻炼,为生育健壮的‘战士’作准备,只有那些身体和情绪合格者,国家才允许结婚。婚后夫妻分居,男子仍在兵营生活，直至 60 岁退伍。为了给国家生育优良的后代，年老体弱的男子允许其他男子分享自己妻子的作法会受到褒扬。私人事务被赋予政治意义，在古典西方实属罕见。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在消除城邦党争，减少内耗方面作用独特,不仅使斯巴达几百年来政治稳定,而且造就出希腊世界最精锐的陆军,他们在抵御外来(如波斯)强敌入侵,保证希腊城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方面，功勋卓著。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说是贵族政治,由于它堵塞了‘王’向君主专制演变的通道,可以认为是‘民主政治’的前奏。这种贵族政治是符合斯巴达社会需要，行之有效的，尤其是城邦至上的整体主义,整齐、划一的社会精神,朴素、平等的公民生活,不仅被当时的一些哲人所推崇①,而且被造就成斯巴达神话,成为西方政治史上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和禁欲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原型,也是西方政治传统中推崇强权,扼杀个性和个人自由,崇拜和神化国家的政治思潮的源头。

雅典在一定意义上被视为古典希腊的代名词，她在希腊世界的地位、影响以及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都是其他城邦所不可比拟的。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制,依列宁的见解,是奴隶制时

①柏拉图、色诺芬等人就十分赞赏斯巴达的城邦制度。《理想国》即是以斯巴达为蓝本。

代古典政治的最高发展阶段。雅典民主制度,作为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重要“基因”,已深埋于西方的政治传统之中。

作为改革型的城邦,雅典政治制度从形成、发展,最终达到民主制的全盛,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实现的。

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政制模式的基础。公元前 594 年,当时希腊著名的“七贤之一”的梭伦(Solon,约前 638 ~ 约前 559)当选为执政官。其时,雅典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已达到了顶点”,城邦面临着坍塌的危险。梭伦的改革旨在调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一根界桩,立于对峙的双方的分界”。而他则“手持大盾,保护两方,不使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①

梭伦改革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为夯实城邦制度而作的社会与经济改革,包括“解负令”,取消债务奴隶,造就了一大批独立的个体的农民,使他们成为雅典城邦的社会支柱;改革财产继承法,允许没有子女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财产②,从而摆脱了财产权的血缘关系的束缚,使财产具有了纯粹个人的性质;大力奖励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雅典工商业繁荣的基础。

二是关于城邦制度本身的政治改革。首先,梭伦把全雅典的公民以财产多寡为依据分为四等,规定了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第一、二等为富裕公民,有权担任执政官和司库等高级公职,同时要自费装备骑兵,负担一些公共事业的开支。第三等级有权担任次要官职,自费装备重装步兵。第四等级,

①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4页。

② 过去的律法规定,死者的全部财产必须留给自己的家庭

不担负任何公职，自费装备轻步兵和水手。四个等级都具有公民权，有权参加公民大会，陪审法庭，选举高级官吏。

其次，健全城邦机构。设立了四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预审提案。尤其重要的是，梭伦改革首创了雅典重要的民主机构——陪审法庭。凡年满 30 岁的雅典公民，只要不欠债都可以通过抽签，成为陪审法庭的成员。陪审法庭是雅典最高司法机关，在城邦政治中有重要的作用。日后"这一机构成为一切公私事情的公断者"，也是平民控制国家权力和制约政府的重要工具。

梭伦改革，对于雅典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债务奴隶的取消，使雅典人解除了沦为奴隶的后顾之忧。至此，所有雅典人(女性除外)成了城邦的公民和城邦的主人，他们对城邦的大小事务都有切实的决定权。平民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使城邦的社会基础有所扩大。而且，梭伦改革开辟了雅典政治发展的方向。改革期间正值雅典发展的十字路口，梭伦对城邦政治的革新，使雅典走上了较为开明和进步的政治轨道，进而发展出一个多样的、开放的和灵活的社会。最终为雅典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成为希腊文明的象征奠定了基础。

当然，雅典城邦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间也有曲折。梭伦改革后不久，雅典的党争有了新的发展，尖锐的党派之争和彼此间的势均力敌，使雅典也出现了僭主政治①，这种政治形式与东方君主国相比尽管较为开明，庇西特

① 公元前 560年，因战功而声誉卓著的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建立了僭主政治。但梭伦所制定的法律，大都保留下来，并率先遵守。

拉图(Peisistrasus,约前600～前527)统治时代也是雅典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但公民的政治权利还是被剥夺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

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公元前6世纪)被平民推认为领袖，领导了雅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民主化改革，使雅典民主政治机构最终确立。为削弱贵族势力，扩大公民的范围，克里斯提尼废除了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代之以10个地区部落，从而清除了血缘关系对政治的最后影响。与此配套,克里斯提尼以500人的议事会取代原先的400人的议事会,由每部落推选50人组成，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和执行由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500人议事会成了雅典政治机构中的行政机关，它的常设机构——执行议事会(Pritany,有人译为'主席团'),由每个部落议事成员轮流当值一年的十分之一(一般任期为35天),执行议事会则以抽签方式每天选出一位主席。这位执行主席就成了这一天全雅典的最高首脑。轮流执政的治理方式是古典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

此外,克里斯提尼还创设了十将军委员会,作为雅典的最高军事机构,设计了'陶片流放法'①,以防止内战和僭主政治的产生。

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的民主政治真正确立。伯里克利(Perikles,约前495～前429)时代,雅典的民主制进一步繁荣直至全盛，成了全希腊的典范。

①也称贝壳流放法，在一年一次的非常公民大会上，公民们把自己心目中认为将危害国家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谁的名字得票最多，就会受到放逐出城邦10年的处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